

党的斗争
白区史话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的白区斗争史话

璞玉霍 徐爽迷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北京

党的白区斗争史话

璞玉霍 著 徐爽 述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东沙屯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11.125印张 280千字

1991年5月北京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5 000 册

ISBN 7-80023-250-6/K·272

定价：5.40元

前 言

共产党的地下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是一个配合的和辅助的部分，但却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白区工作和地下斗争，是我们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这个伟大的神圣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白区斗争，在中共党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全面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以及走这条道路的同时党的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的关系。他指出：“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①

中国革命是经过长期的艰巨的武装斗争和红色根据地的发展，逐步取得胜利的。牢固地树立必须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这是当时必须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城市中心论”曾经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但是，强调和着重解决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绝对不能忽视或轻视城市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99页。

工作和白区斗争。在红色区域之外，还存在着广大的白区。党的白区斗争当然依赖于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党的白区斗争也对武装斗争起了不可缺少的配合作用。特别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党的工作重点也会随着起相应的改变。所以，1944年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摆到同等重要的地位。”^①这就是中国革命道路发展的辩证过程。从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观察，不论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哪里，城市工作都是中国革命道路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否认或忽视这一点，就不能完整、正确地理解中国革命道路的客观规律性。

在农村根据地工作和白区工作的关系上，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两种认识上的偏差，一是“城市中心论”；二是忽视或轻视白区斗争的重要性。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后不久，曾经针对后者说：“白区同志不会打仗，不会做政权工作，正如大多数部队干部和根据地干部不会做白区地下工作是一样的道理。在白区，政权是国民党政权，军队是国民党军队，叫我们白区的同志怎样去学政权工作、学打仗呢！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白区党员的工作条件就要艰苦万倍。在根据地入了党，就有工作做，吃饭、穿衣有了保证，而且每个月还发给零用钱。白区的党员必须自己找饭吃，自己赚钱来养党，自己出钱来做党的工作。党员在白区工作，脑袋好比拴在裤带上，随时都有被敌人拿去的危险。”^②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不久，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曾经谈到毛泽东对我们党的白区工作的一段评价：“董老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专门向中央和毛主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99页。

^② 孙治方：《介绍一本描写地下党的好小说》，《新华文摘》1982年第8期，第253页。

席汇报了南方局的工作，主席听了汇报以后说，我是在苏区工作，搞打仗的，不懂得白区工作，这次听了董老的汇报，使我茅塞顿开。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很艰苦，很努力，有很大成绩。现在看来，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包括所谓的河南的‘红旗党’在内。”^①历史证明，党的白区斗争为党培养、锻炼和输送了一大批干部到乡村，积极支援了农村根据地建设；在白区斗争中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人民民主运动，不断壮大了革命阵营，削弱和牵制了敌人的力量，为配合农村武装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白区斗争也为最后夺取城市做了大量的准备和策应工作。可以说，没有白区斗争的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白区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和政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是党对白区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人帮”一伙诬陷广大地下党员是“叛徒”、“特务”，诽谤地下党组织是什么“叛徒大本营”、“特务窝子”。许多同志横遭迫害和凌辱。这种对白区斗争的污蔑应该统统推倒，白区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充分肯定。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有不可胜数的同志在白区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革命先烈中，有的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在死亡的威胁下，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气节，威武不屈；有的钻进敌人的心脏，依靠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沉着机智，勇敢地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有的历尽艰辛，建立地下电台，在黑暗的夜空发出红色电波，放出光芒四射的异彩；有的置身龙潭虎穴，以各种方式和敌特相周旋；有的根据党的需要，长

① 孔原：《关于南方局的几点情况》，《回忆南方局》第1页。

期从事秘密工作，不为名，不为利，任劳任怨，艰苦奋斗……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将永远为世人所敬仰，他们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不懈！

目 录

前 言	1
一、他们从地下爬起来，又继续战斗了	
——大革命失败，白区党组织转入地下	1
二、工农运动的复兴	
——党的“六大”，白区斗争的初步发展	19
三、党在白区的一条重要战线	
——秘密工作的建立	41
四、白区斗争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第二次“左”倾错误对白区斗争的危害	58
五、在白区的所谓“进攻路线”	
——王明路线对白区斗争的严重危害	72
六、“变屠场为战场，变监狱为学校”	
——共产党人的狱中斗争	99
七、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一二·九运动，党的白区工作走上正轨	112
八、党的白区工作的一次检阅	
——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和白区工作方针 的基本形成	129
九、发展壮大人民力量，领导抗战走向胜利	
——抗战初期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和抗日救亡 运动的蓬勃发展	140
十、“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南方局的建立，白区地下党转入巩固和 隐蔽时期	159
十一、逆流中的砥柱	
——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分裂和倒退的 行为作斗争	172
十二、大后方人民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特务统治	187
十三、统一战线工作的楷模	
——周恩来领导下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	200
十四、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	
——在敌占城市的艰苦斗争中迎接抗战胜利	213
十五、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在国统区的斗争任务	227
十六、实现政协协议，制止内战爆发	
——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进入新阶段	240
十七、冲破政治上的沉闷气氛，开展反美反蒋斗争	
——国统区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高涨	254
十八、配合自卫战争，向反动派进行反击	
——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268
十九、击退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革命运动的猖狂进攻	
——保护党和民主进步力量，开展反迫害斗争	283
二十、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	
——最后一次全国性统一活动	300
廿一、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的情报、策反工作	313
廿二、黎明前的战斗	
——迎接解放	329
后 记	344

一、他们从地下爬起来，又继续战斗了

——大革命失败，白区党组织转入地下

1927年春夏之际，正当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取得辉煌胜利之际，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一场腥风血雨的屠杀开始了……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

大革命失败，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

曾经在武汉从事过地下工作的陶承回忆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时说：“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懂得什么是‘白色恐怖’。反革命的疯狂，他们对革命人民的残暴，如果不身临其境，简直连想都想不到。就是我，虽然生活在那个年代，并且是受直接迫害的，可是在开始时也无法了解国民党匪徒们的心理状态。”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就是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中，在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

1927年3、4月间，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时，蒋介石从南昌到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7页。

上海，走一路杀一路，蓄意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暴行。3月16日，他密令其爪牙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16日，以武力解散了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17日，蒋介石又在九江派他的爪牙，纠合青红帮流氓在街上大叫“打倒赤化分子”等反动口号，围攻和捣毁了国民党（左派）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职工4人，重伤多人。23日，蒋介石又命令青红帮的党羽，在安庆捣毁安徽省总工会，打伤数十人，重伤多人。31日，重庆人民召开群众大会，抗议英舰炮击南京，干涉中国革命，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支援北伐战争，拥护武汉革命政府。这时，四川军阀刘湘同蒋介石相勾结，有预谋地对参加大会的群众，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爱国群众伤亡达1000余人。四川我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地委组织委员冉钧、左派国民党人著名经济学家漆南薰、左派国民党人陈达三等相继遇难，四川大革命的局面遭到了严重破坏。

福建的“四·三”反革命政变，是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奏。1927年4月3日，在国民党右派的密谋策划下，在福州召开了“拥蒋护党”大会，公开发动屠杀革命人士。4月4日，蒋介石从上海来电予以支持和嘉奖。于是，全省各地相继开展“清党”运动，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领袖，或被逮捕，或被屠杀。据不完全统计，从“四·三”政变到1927年底为止，福建全省被捕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工农群众达1305人，被杀害者为569人。革命烈士的鲜血洒遍了八闽大地。

1927年4月10日，在南京又发生了“四·一〇”反革命事件。中共南京地委决定于10日召开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10日上午，约10万群众集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唆使流氓打手捣毁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市总工会的反革命暴行，要求严惩凶手，保护群众集会自由，保护工人运动。大会后，与会群众游行示威。国民党右派早已组织好数百名流氓打手，突然向游行队伍袭击，并架起了机枪。在极度混乱中，压死、踩伤、碰伤、打伤者难以计数，

现场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当晚中共南京地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研究应变措施时，被敌人发现，将会场包围，参加会议的除个别同志逃脱外，有10位同志被捕。谢文景(南京地委书记)、侯绍裘等同志虽经严刑拷打，却个个宁死不屈，三四天后，蒋介石密令将他们杀害。刽子手们还将烈士遗体装入麻袋，投入九龙桥下河水之中。

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大规模屠杀。4月12日在上海，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大批反动军队就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并和青红帮流氓一起疯狂屠杀工人。当时工人纠察队牺牲100余人，受伤180余人。4月13日，上海20余万工人、店员不顾白色恐怖，举行罢工抗议。下午，工人群众在闸北区召开大会，会后沿宝山路向蒋军司令部前进。当群众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蒋介石反动军队，向群众疯狂射击，并以机枪进行扫射。被当场杀死者有百人以上，横尸遍野，伤者无数，时值大雨倾盆，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据不完全统计，在“清党”口号下，到1927年底的9个月时间里，上海一地被屠杀的革命人士达2000人，被捕、流亡达万人以上。全上海陷入一片血海之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和蒋介石订有密约的广东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闭了革命组织。反动派在广州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2100余人，驱逐铁路工人2000多人，优秀的共产党员肖楚女、熊雄、邓培、毕磊、李启汉等在这时英勇牺牲。毕磊牺牲时，年仅25岁。对此，鲁迅在他的《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所附的《自传》中写道：“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并写下了《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表达了对毕磊的深切怀念。

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广西、四川以及无锡、宁波、杭州、厦门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同时，奉系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张作霖在北方大肆屠杀革命者。4月28日，李大钊、范鸿劼等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4月18日，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支持下，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21日，驻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种形势下，武汉政府内部汪精卫集团日益走向反动。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公开叛变了革命。紧接着就在武汉地区进行反革命大屠杀。

国民党反动派在武汉，以法西斯手段破坏共产党组织，两次掀起白色恐怖恶浪，总计屠杀达万人。被杀者有未成年的十多岁少年，也有84岁的白发老人。几个朋友，安闲地在室内谈笑，突然从窗口飞来一阵枪弹，人们在血泊中呻吟着倒下了。而第二天，反革命的报纸上却会出现这样的消息：“共产党于某地密谋起事，为自卫团获悉，当场击毙多人。”一个年轻姑娘，仅仅因为扎着一条红头绳，就会被当作“共产党的密探”，而被真正的国民党密探架走，没多久，人们就在河边发现她的尸体。元宵节，一个住户在门口挂上红灯笼，竟被当作“起事的信号”，主人即被警察捉走。以后，每年这一天，也就成为这一家祭奠死者的日子。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就是这样以旷古未闻的残酷手段，实行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的摧残。

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的省委机关没有一个不遭到破坏，有的甚至几遭破坏，共产党员及其干部牺牲的不计其数。如湖北省委在1928年的3月、5月和11月连续遭到三次摧毁性的大破坏，全省城市9/10已没有党的组织，工人党员下降到不足50

人，许多地方没有支部组织。广东省的破坏也极为严重，广州党组织几乎全遭破坏，省委被迫移往香港。湖南省委在1928年3月和7月的两次大破坏后，在省内难以存身，被迫在9月间将省委机关远迁上海。其他地方的党组织，如北平、南京、江西、浙江、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地也均遭严重破坏。全国党员人数由大革命时期的近6万人减少到1万余人。

1928年6月周恩来在党的“六大”作组织报告中讲到，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时期中，我党的著名活动家和工农领袖被惨杀的就有：陈赞贤、杨闇公、汪寿华、肖楚女、熊雄、邓培、李大钊、范鸿劫、李启汉、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杨培森、肖石月、王一飞、向钧、李子骥、涂正楚、袁孟冰、周文雍、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田波扬、侯绍裘、张太雷、张佐成……等数十人。据周恩来的报告统计，从1927年3月到4月，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被杀害120548—120638人。从1927年5月中旬到11月，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被惨杀达168000—171000人。从广州暴动到“六大”前又被屠杀了26580—52300人。总计1年零3个月中，被惨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5128人—343938人，被投入监狱者4600余人。另据统计，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到1932年以前，至少有100万以上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在新军阀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工会、农会、学生等进步团体，都被打散或被迫转入地下。

国民党新军阀摧残工人运动的一个反动措施，就是封闭、解散或勒令改组革命工会。据国民党官方统计，仅广东全省就封闭、解散了县市工会和各种产业、职业工会200多个；在武汉封闭、解散了100余个。在封闭、解散革命工会的同时，国民党则在各地建立了御用工会。如在上海，大革命失败前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成功时，上海一地登记的工会有537个，会员80万人，有16个产业工会和8个地区办事处。蒋介石指使青红帮流氓杀害了上海总工

会委员汪寿华以后，就派兵占领了上海总工会，组织“工会统一委员会”，简称“工统会”。规定上海工人都要在它的指导下组织工会，凡不经指导，不到它那里登记的工会，一律取缔，不准设立。“工统会”指派委员13名，头头是陈群（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杨虎（上海警备司令），后来群众称他们为“虎狼成群”。在广州、武汉、长沙、杭州和汕头等地则有“工会组织改组委员会”，强迫各工矿企业的基层工人组织向其登记注册，以便他们控制和破坏工人斗争。

国民党新军阀摧残工人运动的另一个措施，就是在重要的工矿企业中，由反动军警和特务组织一个白色恐怖网，在许多企业中实行法西斯的“连坐法”，广设“密告箱”。一旦发现某一工人与红色工会有些联系，则他附近的5至10人便须连坐，轻则开除，重者坐牢、屠杀。工人常常因为反对特务的监视和其他暴行，而被扣上“赤化嫌疑”、“不良分子”等罪名，有的则交军法处置，不是常年投入牢狱，就是惨遭杀害。在上海、武汉、福州和广州，工人竟因在革命失败前参加过革命工会或革命运动而大批被开除、被屠杀。如“四·一二”后，上海中华书局的资本家推翻了革命失败前的劳资协议，工人罢工抗议，资方一次就开除原来的工人360人。

大革命失败后，工人阶级在大革命时期争取得来的政治、经济权利完全丧失了。如上海纱厂工人在上海总工会存在时期所争得的条件都被厂主取消，以前工人在吃饭时能停车半小时，现在取消；放工前早停车15分钟取消；车间里原来有椅子，工人可以休息，也取消；工头整天拿着竹鞭象打牛马似的对付童工，并且不许啼哭，一哭便打得更厉害。许多工厂都开除成年女工与男工，而以童工或刚从乡下来的人代替他们。许多工厂规定了一个招工条件，就是凡参加过工会的人都不要。工人工资也大幅度下降，上海各业工人的工资都大量减少，武汉工人有80%降低了工资，北方铁路局拖欠工人工资几个月到十几个。工人的劳动时

间延长，劳动强度加大。总之，在新军阀的统治下，工人阶级处于政治上毫无权利、经济上毫无保障的地位。

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农村里地主阶级疯狂地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农民协会被解散，农民领袖被杀，大革命时期的减租减息变为加租加息，土地日益集中到地主豪绅手中。赋税逐年增加，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加上天灾战祸，广大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八·七”会议关于《关于党的组织问题 议决案》，党的组织转入地下

大革命时期我党处于公开或半公开状态，当汪精卫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时，中央政治局即转入秘密状态。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是党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和《告全党党员书》，对于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团结全党，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使白区党组织迅速地有秩序地转入地下，从而担负起新的历史任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转入秘密状态，指出：“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决议规定省市县区级党部委员会都应在最近期间改组，在每一党部委员会建立起3至8人的常务委员会，执行各该党部的一切职权；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应“建立极密切极秘密的联系”；决议强调严守党的纪律包括秘密工作纪律，是党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存在、发展与进行工作的基本条件之一；决议还指出：“应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扩大党的影响”，如组织工会、学生团体、妇女团体、俱乐部等类之组织；决议还要求在各级党部委员会之下，“组织审查委员会（各

省委就是监察委员会)，以审查各该党部之党员有否不可靠的分子。”同时指出：“我们党应当在此过渡于秘密状态之际，极力保存多量的党员”。决议要求“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但是集权制度不应当消灭党内的民权主义。”^①很明显，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应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区（后习惯称白区）工作的环境，相应的改变党的组织和工作方法的必要措施。中央为了迅速贯彻“八·七”会议关于《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1927年8月19日又发出了《中央通告》第2号，对决议作了进一步解释。

“八·七”会议有重要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很不成熟，还不能对陈独秀右倾错误在理论上思想上作系统的分析和清算，也不能对新的方针和政策在理论上思想上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阐释。尤其是党第一次遇到白色恐怖的环境，大批同志和革命群众被敌人逮捕杀害了。许多不坚定分子和投机分子跑的跑，叛变的叛变。……当时留在党内的同志，看到革命被陈独秀主义糟蹋了，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拼命的精神，因而又萌发了“左”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在革命干部中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他们具有赴汤蹈火的革命决心，却还缺少无产阶级的坚韧精神，这种“左”倾情绪更容易滋长起来。

这种“左”倾情绪在两个方面的表现，给党的白区斗争带来了危害：

一是党领导工人运动在策略上有“左”的错误。党在当时并未认识到城市工人运动已处于低潮，不仅没有提出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反而主张向反动派加紧进攻，要求城市和农村一样，“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②。“八·七”会

① 《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7页。

② 《八七会议》，第43页。